

从莫里斯到生成式 AI：社会设计伦理的历史延续 与人机协同路径

肖佳瑞

东北大学，辽宁 沈阳 110819

DOI:10.61369/HASS.2026050037

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引发了设计主体弱化、算法偏见及责任模糊等伦理困境，亟需在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设计伦理的演变规律以寻求应对策略。文章采用文献分析与比较研究方法，以威廉·莫里斯的手工艺思想为起点，遵循问题提出—历史转型—现实困境—路径回应的逻辑，系统梳理现代设计史中“为社会而设计”的责任转型轨迹。研究表明，设计的社会责任随技术发展不断演变，经历了从批判工业劳动异化到关注大众生活及社会创新的转型；智能时代的伦理核心依然是技术效率与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博弈。面向生成式 AI 时代，文章提出通过坚守人的主体地位、建立透明可追溯机制等手段，构建负责任的人机协同路径，为技术服务社会公正与公共福祉提供参考。

关 键 词： 威廉·莫里斯；社会设计；设计伦理；生成式人工智能；人机协同

From Morris to Generative AI: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Social Design Ethics and Pathways for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Xiao Jiarui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819

Abstract：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given rise to ethical dilemmas such as the weakening of design agency, algorithmic bias, and ambiguity in accountability.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re-examine, within a historical context,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design ethics in order to identify appropriate responses. Employ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this paper takes William Morris' s handicraft thought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and follows the logic of problem formulation,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contemporary predicament, and strategic response. It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ponsibility in modern design history under the idea of “design for societ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design has continuously evolved alongsid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undergoing a shift from the critique of alienated industrial labor to a broader concern with everyday life and social innov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age, the core ethical issue remains the tens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and human agency. In response to the era of generative AI, this paper proposes constructing a responsible path for human-AI collaboration by upholding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human agency and establishing transparent and traceable mechanisms. In doing so,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ensuring that technology serves social justice and public welfare.

Keywords： William Morris; social design; design ethic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引言

设计并不是单纯的形式创造，也不是孤立的审美活动。它总是与一定时代的技术条件、生产方式和社会价值联系在一起。现代设计史中的许多重要变化，都与工业化、机械生产、消费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关。王受之在《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将工艺美术运动、包豪斯、现代主义设计等放在现代设计形成的历史脉络中讨论^[1]，佩夫斯纳将现代设计的历史起点追溯到威廉·莫里斯，并把莫里斯与格罗皮乌斯之间的关系看作现代设计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2]。李砚祖设计活动不能脱离文化、技术和人的需要来理解^[3]。尹定邦、邵宏也强调，设计学研究应关注设计与社会、经济、技术、审美之间的综合关系^[4]。因此，讨论“为社会而设计”，不能只看设计作品的形式好坏，还要追问设计服务于谁、由谁参与、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

19世纪的莫里斯面对的是工业机器带来的劳动分工和审美贫困；20世纪现代主义面对的是如何利用工业生产改善大众生活；今天，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设计师的工作方式和设计作品的生产方式。三者所处时代不同，但都涉及同一个核心问题：当技术效率不断提高时，设计是否还能坚持人的主体性、劳动尊严和社会责任？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莫里斯的手工艺思想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现代设计对莫里斯问题作出了工业化回应，但也在消费主义中出现新的偏差；生成式 AI 时代，设计的社会责任需要在人机协同中重新建立。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比较研究的方法，按照“问题提出—历史转型—现实困境—路径回应”的逻辑展开，梳理社会设计伦理的发展脉络，并分析其在智能时代的应对策略。

一、莫里斯手工艺思想中的社会批判

威廉·莫里斯把设计问题放到社会结构中思考，他批判的重点并不只是产品不美，而是机器化生产背后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分离。在工业化生产中，工人往往只承担某一道重复工序，无法完整参与产品从构想到制作的全过程。劳动者失去了对材料、技艺和产品意义的把握，劳动也就容易变成单纯谋生的手段。莫里斯强调手工艺，正是为了反对这种劳动分裂。他认为，劳动不应只是被迫完成的任务，也应包含创造的快乐和人的自我实现。《乌有乡消息》描绘了一个劳动、生活、自然和艺术重新结合的理想社会，这说明莫里斯的设计理想背后有明确的社会批判意识^[5]。

因此，莫里斯的“手工艺”不能简单理解为怀旧。他真正关心的是，普通人能否在劳动中获得尊严，能否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美，能否不被机器和资本完全支配。郑立君指出，莫里斯的艺术思想与社会主义理想密切相关，他反对商业主义和机械文明对人的创造性的压制^[6]。这说明莫里斯讨论艺术和设计，并不是只讨论形式，而是在讨论人的劳动状态和社会生活。

不过，莫里斯的实践也存在明显矛盾。他创办的设计公司坚持手工制作和优质材料，生产壁纸、织物、家具等产品。这些产品质量很高，也对后来的设计史产生影响，但因为成本较高，主要消费者仍然是中上阶层。这一矛盾可以称为莫里斯设计实践中的价格悖论。仅仅依靠手工艺和审美理想，并不能自动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如果生产关系、消费结构和财富分配没有改变，高质量设计仍可能成为少数人的消费品。莫里斯的价值正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后来不断被设计史重复追问的问题：设计究竟是服务少数人的品味，还是服务多数人的生活？技术和市场提高了效率，但是否也削弱了人的主体性？

二、现代设计社会责任的转型

进入20世纪以后，工业化已经无法逆转。现代设计不可能简单回到莫里斯式的手工艺生产。于是，现代主义设计对莫里斯问题作出了另一种回应：不是拒绝机器，而是试图改造机器生产，使工业化服务于大众生活。

包豪斯试图打破艺术与工艺之间的隔阂，同时接受工业化生产的现实。现代主义设计强调功能、结构、标准化和批量生产，其社会理想是通过简洁、实用、经济的设计，让更多人获得质量较好的生活用品和居住环境。从这一点看，现代主义并不是完全背离莫里斯，而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延续了设计应服务社会的问题意识。

功能主义设计强调使用效率和生产合理性，有助于降低成

本，改善公共设施、住宅、家具和日用品的质量。但功能主义也有局限。如果设计过度依赖标准化和理性秩序，就可能忽略地方文化、个人差异和真实生活的复杂性。当功能变成唯一标准时，设计也可能走向冷漠和单一。

二战以后，消费主义兴起，设计越来越深地卷入市场竞争。许多设计不再主要解决真实需求，而是服务于广告、包装、流行和快速更新。在这一背景下，维克多·帕帕奈克重新提出设计的社会责任问题。他在《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中批判了大量无意义设计和消费主义设计，强调设计师应关注弱势群体、残障人士、生态环境和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7]。帕帕奈克的批判表明，现代设计虽然曾经以服务大众为目标，但在商业资本推动下，也可能转向制造欲望和刺激消费。由此，设计伦理的问题从如何生产更好的物品进一步转向设计是否真正改善生活。

进入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后，社会设计的对象继续扩大。曼奇尼提出“人人设计”的观点，强调普通人、社区、组织和城市都在通过实践改变自身生活方式，专业设计师的任务不再只是提供成品，而是支持和放大这些社会创新过程^[8]。这意味着设计师的角色发生变化，从单一的造物者，转向问题组织者、协作促进者和公共价值的协调者。

由此可见，现代设计社会责任经历了三次转型：第一，从莫里斯的手工艺思想转向工业化大众设计；第二，从功能主义的大众生活改善转向对消费主义的批判；第三，从专业设计师主导转向公众参与和社会创新。

三、生成式 AI 时代的设计伦理困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使设计再次面对技术变革。AI 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创作门槛，使非专业者能够参与视觉表达和概念生成。但是，效率提高并不等于设计责任自动提高。生成式 AI 介入设计后，首先出现的是创作主体弱化的问题。设计师可能从直接构思和制作的人，变成提示词输入者和结果筛选者。如果设计师只是选择模型生成的图像，而缺少自己的判断、修改和价值立场，设计作品就容易成为已有数据和算法风格的再组合。

其次是算法黑箱问题。帕斯奎尔在《黑箱社会》中指出，算法系统的不透明会影响信息分配、权力结构和责任追究^[9]。在 AI 辅助设计中，用户往往只看到输入和输出，却难以了解模型为什么生成某种结果。如果 AI 生成了侵权图像、歧视性内容或误导性方案，责任应由设计师、平台、模型开发者还是数据提供者承担，往往并不清楚。再次是算法偏见问题。奥尼尔在《算法霸权》中指出，数学模型和大数据系统可能复制甚至放大现实社会

中的不公平^[10]。生成式 AI 的训练数据来自已有图像、文本和网络内容，而这些数据本身并不完全中立。如果数据主要来自主流文化、商业平台或强势群体，那么模型生成的内容也可能强化主流审美，忽视边缘群体和地方文化。

此外，生成式 AI 还可能带来文化同质化。许多 AI 图像虽然表面上丰富多样，但在构图、色彩、光影和风格上可能趋同。这是因为模型往往根据已有数据中的高频模式进行生成。对于地方工艺、少数民族审美和非主流表达来说，如果它们在训练数据中占比较小，就可能在算法生成中被弱化。

我国已经开始对人工智能伦理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制度规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提出，人工智能活动应遵循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等要求^[11]。《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2]，《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13]等规定说明，生成式 AI 的设计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工具使用问题，而是涉及法律、伦理、文化和社会责任的综合问题。AI 可以帮助设计师提高效率，但也可能使设计过程更加不透明，使责任边界更加模糊。正是在这一点上，AI 时代重新提出了莫里斯关心的问题：当技术系统变得强大时，人是否仍然能够掌握劳动过程和价值判断？

四、人机协同的社会设计路径

面对生成式 AI，简单拒绝技术并不现实，完全依赖技术也不可取。更合理的方向是建立负责任的人机协同机制，使 AI 成为设计师和公众的辅助工具，而不是替代人的判断和责任。

第一，应坚持人的主体地位。AI 可以用于资料整理、图像生成、方案发散、情景模拟和文本辅助，但设计的最终价值判断不能交给算法。设计师需要判断方案是否真实回应需求，是否尊重使用者，是否可能造成排斥、误导或不公平。

第二，应建立透明和可追溯机制。AI 参与设计时，应尽可能记录使用的模型、数据来源、生成过程、人工修改情况和最终决策依据。特别是在公共设计、城市更新、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等领域，设计方案会影响较多人的生活，更需要说明 AI 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第三，应加强公众参与。社会设计的对象往往不是单个产品，而是社区空间、公共服务、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因此，受影响的人不能只是被动接受设计结果，而应参与问题定义和方案讨论。AI 可以帮助居民表达想法、生成可视化方案、模拟不同选

择的影响，但不能代替居民对自身生活经验的判断。

第四，应重视数据公平。AI 设计系统依赖数据，数据不完整或存在偏见，生成结果就可能偏向某些群体。社会设计尤其需要关注老人、儿童、残障人士、低收入群体和其他容易被忽视的人群。设计师在使用 AI 工具时，应主动检查数据来源和适用范围，不能把算法输出直接当作客观结论。

第五，应建立伦理审查和价值敏感设计方法。《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强调，对可能影响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公共秩序等方面的科技活动，应加强伦理审查和风险防控^[14]。古天龙等关于价值敏感设计的研究指出，符合伦理的人工智能应用需要在设计阶段识别利益相关者，并把人的价值纳入系统设计过程^[15]。郑煌杰也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可信治理应从数据、算法、责任和协同治理等层面展开^[16]。

因此，人机协同的社会设计路径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核心，以 AI 为工具，以公众参与为过程，以伦理审查为保障。它既不回到莫里斯式的单纯手工理想，也不把现代技术看作自动进步的力量，而是在技术使用中重新建立责任边界。

五、结语

从莫里斯到生成式 AI，设计史中的社会责任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不同技术条件下反复出现。莫里斯批判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异化和审美贫困，提出艺术、劳动与日常生活重新结合的理想。现代主义设计试图利用工业化生产改善大众生活，但后来又在消费主义中暴露出新的问题。帕帕奈克和曼奇尼进一步将设计责任推向真实需求、弱势群体、生态环境和社会创新。

今天，生成式 AI 再次改变设计的工具、流程和主体关系。它能够提高效率，扩大参与，也可能带来主体弱化、算法黑箱、偏见放大、文化同质化和责任不清等问题。因此，智能时代的社会设计不能只讨论 AI 能做什么，更要讨论 AI 应该为谁服务、由谁监督、产生什么后果。

本文认为，“为社会而设计”的逻辑闭环在于莫里斯提出了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现代设计试图通过工业化回应大众需求，AI 时代则需要通过人机协同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未来的设计不应停留在技术崇拜或技术恐惧中，而应把技术纳入公共价值、伦理审查和社会参与之中。只有这样，设计才能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继续服务于人的尊严、公平和共同生活。

[1] 王受之. 世界现代设计史：第2版 [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2] 佩夫斯纳 N. 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沃尔特·格罗皮乌斯 [M]. 何振纪，译.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

[3] 李砚祖. 艺术设计概论 [M].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

[4] 尹定邦，邵宏. 设计学概论：全新版 [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5] 莫里斯 W. 乌有乡消息 [M]. 黄嘉德，包玉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 郑立君. 威廉·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 [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5)：40–44.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6.

[7] 帕帕奈克 V. J. 为真实的世界设计 [M]. 周博，译. 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

[8] 曼奇尼 E. 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社会创新设计导论 [M]. 钟芳，马谨，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9] 帕斯奎尔 F. 黑箱社会：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 [M]. 赵亚男，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0] 奥尼尔 C. 算法霸权：数学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与不公 [M]. 马青玲，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11]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EB/OL]. (2021–09–25).

[1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EB/OL]. (2023–07–10).

[1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EB/OL]. (2022–12–11).

[14] 科技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 [EB/OL]. (2023–10–08).

[15] 古天龙，马露，李龙，闫茹. 符合伦理的人工智能应用的价值敏感设计：现状与展望 [J]. 智能系统学报，2022，17(1)：2–15. DOI:10.11992/tis.202105002.

[16] 郑煌杰.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与可信治理路径研究 [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5，42(12)：38–48. DOI:10.6049/kjbydc.2024050008.